

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空间重构后的 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以安徽省淮北市为例

管晶^{1, 2} 焦华富¹ 耿慧¹¹

(1. 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 中国安徽 芜湖 241003;

2. 扬州大学 商学院, 中国江苏 扬州 225127)

【摘要】: 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空间重构后的居住满意度是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以典型煤炭资源型城市淮北市为例, 对安置后的采煤塌陷区农民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其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居住空间重构后的农民居住满意度具有6个维度的结构特征, 其评分由高到低分别为: 配套设施、住宅条件、人际交往、社区环境、社区参与和经济收入; 农民对总体居住满意度的评价一般, 且自建类独院社区高于统建类多层公寓社区; 农民的教育程度、职业、个人月收入、住宅条件、社区环境、经济收入、配套设施以及人际交往显著影响重构后的总体居住满意度, 其中住房条件是最主要因素, 而经济收入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文章最后提出优化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空间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采煤塌陷区 居住空间重构 居住满意度 淮北市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2) 01-0168-08

我国是煤炭资源大国, 也是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和消费国^[1]。长期以来, 煤炭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在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也在开采地形成了大量的塌陷区, 造成耕地损毁、房屋倾倒、基础设施受损, 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2]。截至2020年, 仅皖北六市就有近1000个自然村受到采煤塌陷的影响, 约60万农民需要重新安置, 其居住空间被迫发生重构^[3]。了解居住空间重构后的农民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对于妥善解决采煤塌陷区村庄安置、缓解“村矿”矛盾, 实现煤炭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自1980年代起, 国内学者开始对采煤塌陷区进行研究, 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塌陷区综合治理^[4,5], 土地复垦技术及模式^[6],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7]等方面。进入21世纪, 随着“村矿”矛盾日益突出, 学者们开始关注采煤塌陷区村庄搬迁问题, 研究内容涉及村庄搬迁模式及特征^[8,9], 搬迁对耕作的影响^[10]以及搬迁补偿^[11]等。例如, 陈景平等研究发现采煤塌陷区村庄搬迁后, 农民耕作土地减少、耕作半径增加、耕作积极性减弱, 越来越多的农民直接放弃农业生产^[10]; 黄翌等认为中国采煤塌陷区村庄搬

作者简介: 管晶 (1991—), 女, 安徽淮北人, 博士, 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城市经济。E-mail: guanjing1010@163.com; 焦华富 (1962—), 男, 安徽黄山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城市经济。E-mail: jiaohuofu@263.net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171144)

迁主要有城郊社区型、矿村结合型和中心集聚型 3 种类型^[12];Yang 等对全国 6 个省 27 个因矿产开采而被迫搬迁村庄的研究,发现农民对于搬迁补偿表示不满意,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13]。然而,既有研究忽视了从微观社区层面对农民居住空间重构后的居住特征和主观感知的定量分析。

居住满意度是居民对住房和社区的实际居住体验与其期望相比而形成的综合性评价,与预期的居住体验差距越小,居住满意度越高,反之,则居住满意度越低^[14]。国外学者对居住满意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15],分析居住满意度和迁居意愿关系^[16]。国内相关研究多为居住环境评价^[17]。此外,何深静、湛东升、刘志林等学者也讨论了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18,19,20],选取的案例地多为大都市(如广州、北京等),研究对象涉及城市居民^[18,19]、老年人^[21,22]、贫困人口^[14]以及城市被动式动迁居民^[23]等群体。然而,从微观层面反映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空间重构后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不多见。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安徽省淮北市多个采煤塌陷安置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定量分析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空间重构后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以期改进我国采煤塌陷区农民的安置建设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研究区概况

淮北市位于安徽省北部,下辖三区一县(相山区、杜集区、烈山区和濉溪县),地处苏豫皖三省交界,是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图 1)。2019 年,全市 GDP1077.9 亿元,财政收入 140.5 亿元,常住人口约 227.0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65.9%。市域煤炭资源丰富,且煤种齐全、煤质优良,自建市以来,已生产原煤近 10 亿 t,在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也形成了众多的采煤塌陷区。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塌陷土地约 35.3 万亩,搬迁村庄 386 个,涉及失地农民近 30 万人。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空间重构后的居住情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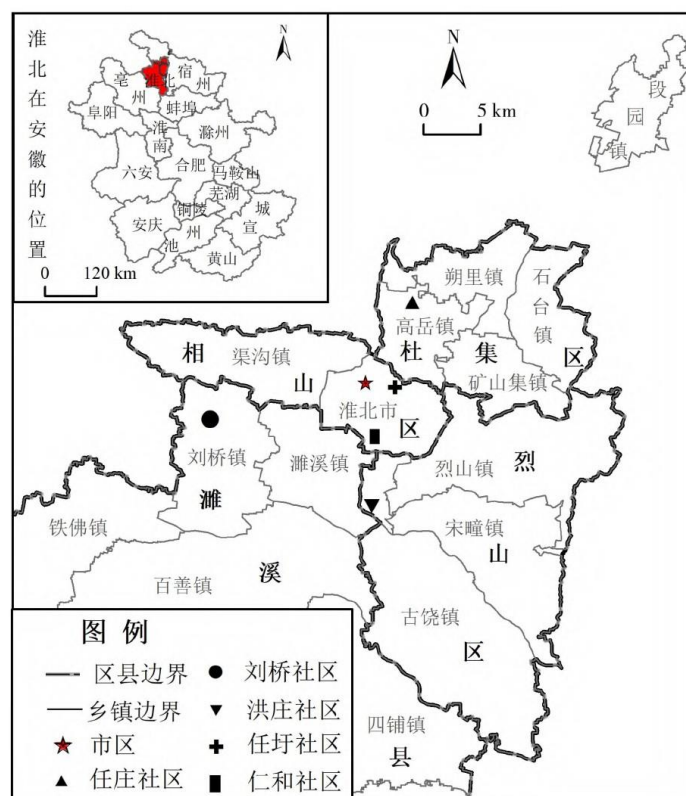


图 1 淮北市及样本点区位

2 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2.1 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访者的基本属性，包括年龄、性别、个人月收入、家庭构成、文化程度、有无复垦土地以及家庭经济来源。第二部分是农民的住房特征，包括住房的建设类型、进城便捷程度，旨在考察农民居住空间重构后的住房区位和形式对居住满意度是否存在影响。第三部分是农民居住满意度的测量题项。因居住空间是一个多维复合空间，是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在内的复杂系统，且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农民主要关注新建房屋的质量、住房周边的配套设施和环境、搬迁补偿等方面内容，故在参考冯健、何深静、湛东升、何艳冰、Addo 等人研究成果^[14, 18, 19, 24, 25]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结果，从住房条件、配套设施、经济收入等多个维度构建居住满意度评价指标，以期得到更为科学、系统的测量结果。设计的居住满意度评价体系由 21 个测量题项构成，同时还设计了“您对目前居住情况的总体满意程度”这一题项来测度农民居住空间重构后的总体居住满意度。问卷的所有题项均采用 5 点李克特量表测量（1 代表非常不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正式调研前，课题组对淮北市采煤塌陷区安置社区的农民进行了预调研，并根据预调研情况修正了调查问卷。最后，选取 5 个典型安置社区进行了正式的问卷调查，所选取的 5 个调查地点覆盖了采煤塌陷区安置社区的所有类型。仁和社区（2009 年建）和洪庄社区（2004 年建）属于多层公寓社区，距离城区较近，采用政府统一建设的方式；任圩社区（1990 年建）属于老旧住房社区，搬迁时间较早，采用政府规划、农民自建的方式；刘桥社区（2005 年建）和任庄社区（1999 年建）属于乡村社区，距离城区较远，规模较大，为农民自建的两层独栋楼房。正式调研过程中，调研组人员采取入户的方式，每户发放问卷 1 份，由户主填写，问卷填写完成后立即收回。共发放问卷 700 份，收回 675 份，去除无效问卷 53 份，最终有效问卷 622 份，问卷有效率 92.15%。

2.2 样本特征

受访者以中青年为主，大部分为已婚，且以核心家庭居多；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90.51%的样本都是高中及以下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到 3.38%；职业层次不高，83.60%的受访者没有或者仅有 1~2 亩复垦土地，打零工成为大多数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个人月收入较低，其中 83.44%的样本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下。在安置方式方面，大部分社区就近安置，一般靠近城镇或矿区。

3 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空间重构后的居住满意度

3.1 居住满意度的维度

使用 SPSS 软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提取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满意度的维度。在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前，对测量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检验显示，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807，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然后，通过 KMO 和 Bartlett 检验来判断元变量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检验结果显示：KMO 值为 0.869，Bartlett 值为 6206.171，P 值为 0.000，由此可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萃取，共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 6 个维度，累积贡献率 67.789%，承载了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将 6 个维度分别命名为住宅条件维度、社区环境维度、经济收入维度、社区参与维度、配套设施维度和人际交往维度。

3.2 农民居住满意度的特征

为了评价居住空间重构后农民总体居住满意度情况，首先，对“您对目前居住情况的总体满意程度”测量题项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总体居住满意度均值为 3.13¹，表明农民对总体居住满意度的评价一般。然后，统计不同社区在各维度的满意度

均值。可以看出，搬迁时间的长短以及迁入社区的空间差异对农民总体居住满意度的影响不大，但迁入社区的建设类型影响显著；同时，农民在不同维度的平均满意度也差异较大。因此，下面从社区类型和维度两方面对农民居住满意度进行分析。

3.2.1 居住满意度的社区类型分异

对不同社区类型居住满意度的比较分析发现：自建类的独院式住宅社区（任圩社区、任庄社区、刘桥社区）的满意度普遍高于统建类的多层公寓社区（仁和社区、洪庄社区）。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空间的变迁是政府主导的重构过程，原有村庄的拆迁和新社区的建立都是在政府统一规划下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居住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多层公寓社区相较于独院式住宅社区在社区环境和住房条件等方面变迁更大。面对这种变迁，一方面，受访者普遍反映生产空间、存储空间以及休闲空间（种菜、养鸡、存放三轮车以及居民聊天的开放空间）变少了，而这种带有集体记忆的公共空间的消失以及存储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减少影响了农民对居住环境的体验；另一方面，在访谈中超过一半的居民反映政府统建的房子住房质量较差，存在房屋漏水、墙体剥落和裂缝等问题，降低了农民对于住房条件的体验。同时，多层公寓社区一般更靠近城镇或矿区，在水电、煤气等生活成本的花费上普遍高于独院式住宅社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住房感知。

3.2.2 居住满意度维度分异

受访者居住满意度各维度均值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对配套设施、住宅条件以及人际交往维度的满意度相对较高，而对经济收入维度的满意度最低。六个维度的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配套设施（3.44）、住宅条件（3.37）、人际交往（3.36）、社区环境（3.03）、社区参与（2.92）、经济收入（2.71）。

多年来，淮北市采煤塌陷安置社区的建设一直与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以及工矿建设相结合，旨在打造一批新型美丽乡村和设施齐全的社区。政府在选取新址时一般靠近城镇或矿区，并注意住房条件的完善和基础设施的配置。居住空间重构后，住宅的空间布局由分散转为集中，同等的公共产品投入产生了更大的效益，公共服务效率得到了提升，农民居住空间的物质环境得到了优化，因此农民对住宅条件、配套设施维度的满意度总体上评价较高。

吴莹^[26]和杨云彦^[27]等人的研究认为移民社区的建立会使农民社会结构和人际交往发生改变，社会空间出现松散和断裂的现象。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不同，本文研究表明：居住空间重构后，采煤塌陷区农民对人际交往维度的满意度评分较高，近80%的农民认为现在的社区邻里关系较为和谐。这是因为与一般性的移民不同，采煤塌陷区村庄搬迁距离较短，一般在原址的10km以内，对农民生产、生活、社会关系以及风俗习惯影响较小。同时，政府采取的整村搬迁、分片安置的搬迁模式使农民居住空间重构后同质化程度较强，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得以延续。

居住空间重构后，农民对经济收入（2.71）和社区参与情况（2.92）不尽满意。农民对于经济收入维度的不满主要原因为：首先，认为补偿标准太低。由于我国没有解决采矿引起的农民搬迁问题的相关法律，对于补偿标准的划定大多是地方政府、矿业公司与受影响农民代表经谈判协商而确定。在访谈中，农民普遍反映补偿标准过低，对于原有房屋的补贴远不够在新社区购买新房，他们不得不花费家中原有积蓄甚至向亲戚朋友借贷来支付房屋差额。其次，移民安置对原有土地经营产生影响。农民在安置过程中很难获得新土地，只能依赖原村的农业用地，但是一方面塌陷使土地的数量减少、质量降低，生产能力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搬迁村庄与原村庄有一定的距离，人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成本，使耕种变得更困难，造成部分农民被迫放弃土地。最后，搬迁后生活成本显著提升。在访谈中不少受访者表示搬迁后虽然生活方便了，但同时也需要交付物业费、水费、煤气费等原先没有的费用。补偿金主要用于购买房屋，农业生产受到不利影响，再加上生活成本的提升使农民经济发展能力受损，降低了其对经济收入维度的满意度。农民对社区参与维度的满意度仅高于经济收入维度，维度下的3个题项（社区选举2.90、社区活动2.95、社区建设2.91）的得分均较低。伴随居住空间的变迁，原有小范围、以村落为单位的管理模式向大范围的、以社区为单位的模式转变，管理程序更为复杂，农民对于公共事务的话语权受损。在访谈中，半数以上的农民表示，搬迁后政策的透明度降低，村干部权力增大，他们对社区建设和活动的参与程度不高。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参与社区事务和活动的积极性受到挫

伤，被边缘化的感觉日益强烈，对社区参与维度的满意度不高。

4 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模型及变量选择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农民的社会经济属性、住房特征和住宅条件、社区环境、经济收入、社区参与、配套设施、人际交往维度对总体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回归分析的因变量为农民的总体居住满意度，为探讨农民总体居住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将农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和住房特征设置为控制变量，再逐步引入 6 个维度作为自变量。所有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纳入回归模型，自变量为分类变量的引入虚拟变量参与回归。所有模型均通过 0.001 的显著性检验， R^2 在 0.25 以上，方差膨胀因子小于 10，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4.2 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住宅条件维度对农民总体居住满意度的影响系数为 0.267，是影响其总体居住满意度的首要因素。住宅条件是农民住房消费的最基本需求，是农民日常活动的最小空间单元^[26]，也是人们使用最频繁的场所，而且住宅质量、面积的大小和布局形式会直接影响农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因此对采煤塌陷区农民总体居住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最大。

经济收入维度对农民总体居住满意度的影响系数（0.234）次之。住房的作用不仅仅限于居住，还与个人自主、财富、社会地位、舒适等感知相关。而经济收入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能直接决定人们的这些感知，继而影响其住房体验；重构后农民居住成本的增加以及经济发展能力受损加剧了其对于经济收入的重视程度。

社区环境、配套设施、人际交往维度对农民总体居住满意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181、0.173、0.177，影响作用也较大。社区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民日常生活品质的高低，在调查中发现：社区的安全和卫生问题是农民最为关心的两个核心元素。这可能是因为高层住宅形式中，人们必须把车辆等物品放在楼下，治安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民的财产安全；而良好的社区卫生情况是农民健康生活的前提条件。配套设施维度和人际交往维度对总体居住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低于社区环境因子，且两者相差不大。相较于高收入阶层，低收入者活动范围更为狭窄，对于公共设施较为依赖，因此医疗、购物、学校等公共设施的配置情况会对农民的总体居住满意度产生影响。良好的邻里网络关系和成员互动能够促进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进而提高居住满意度，因此人际交往维度在农民总体居住满意度评价中也起到较大的作用，但是其影响程度低于住宅条件、社区环境等硬件设施。

社区参与维度对农民总体居住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一方面，农民居住空间重构后的社区归属感不强，参与社区建设意识薄弱。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生产模式使农民更为关注个体利益，因此农民对于社区建设结果（社区环境、住宅的好坏等）的敏感度大于对于过程参与的敏感度。

在农民社会经济属性方面，受教育程度、职业和个人月收入显著影响其总体居住满意度。在受教育程度上，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与文盲相比，总体居住满意度更低，这可能由于学历较高的农民就业、生活能力较强，对居住条件要求也相对较高，对居住满意度的评价就可能更低。在职业上，从事打零工、个体经营等职业的农民相较于在矿上上班的农民满意度更高，这与最近几年煤炭行业不景气，矿工收入较低密切相关。其中，从事教师等正式工作的居民总体居住满意度最高，这是因为该群体大多为正式在编的退休人员，有稳定的收入，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居住体验也较好。在个人月收入上，收入在 4000 元以上的农民与收入在 1000 元以下的农民相比，满意度显著提高，这与前文研究的经济收入因素对居住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相一致。而与前文研究结果不符的是：月收入 1000~2000 元的农民相对于 1000 元以下的农民满意度更低，可能的解释是：收入在 1000 元以下的居民大多为 50 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大多从事农业劳动，需要的花销少，对居住条件的要求也低。此外，在住房特征方面，认为进城较为方便的农民和不方便的农民相比，居住满意度更高；居住在自建类住房的农民比居住在统建类住房的农民满

意度更高。性别、年龄、家庭结构、复垦土地量对农民总体居住满意度均没有显著的影响。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针对淮北市采煤塌陷区的 5 个典型安置社区展开问卷调查,通过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研究居住空间重构后农民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民总体居住满意度水平一般,住房形式与传统民居更为相似的自建类独院社区的满意度高于统建类的多层公寓社区,农民对于多层公寓社区的不满主要体现在对于居住习惯的不适应和住房质量的担忧。②居住空间重构后,农民的住房基础条件和相关配套设施得到了较大改善,基本实现了政府提出的让搬迁农民居住环境显著改善的目标。但是,补偿标准过低以及搬迁后原有的产业体系断裂、土地资本受损和生产空间被压缩,为农民家庭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使其生产生活的高质量发展能力不足。③与现有研究认为“村改居”社区的建立会使移民社会空间出现断裂不同,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空间重构后社会关系网络保持良好,但是原有基层自治组织结构的破坏,使传统制度空间发生改变,农民社会参与感和归属感不强。④农民的职业、学历、月收入、住房特征、住宅条件、经济收入、社区环境、配套设施以及社会网络显著影响重构后的总体居住满意度。其中,家庭收入等经济因素和住宅条件等物质因素的作用强度大于邻里关系等社会因素。

在安徽淮北市将采煤塌陷区农民安置与农村建设结合的背景下,结合以上结论,对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空间的优化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住宅条件是影响采煤塌陷区农民总体居住满意度最为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农民对居住格局和管理模式发生重大变迁的多层公寓住宅的适应存在诸多困难。因此,在解决移民安置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政府不仅要关注基础设施等物质环境的建设,还要充分考虑农民对居住空间的感知和适应情况,应以人为本、因地制宜,选择农民容易接受的居住社区模式。同时,在房屋建设的过程中,政府要加强监督力度,保障房屋质量。

第二,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空间重构过程中,“搬得出”只是第一步,“能致富”才是本质目标。农民的经济收入显著影响居住满意度。为此,政府和煤炭企业在对村庄搬迁的过程中,要关注农民的生计问题。一方面,积极促进建立搬迁农民与煤炭企业利益共享机制,提高搬迁补偿标准,使农民在搬迁后有足够的资金另谋职业。另一方面,要对采煤塌陷区农民进行分层次、分领域、分类型的技能培训,提升其人力资本和非农就业能力。同时,政府也要合理有效地复垦耕地,加快土地流转速度,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农民生计的多样化,提升其整体收入水平。

第三,要积极地整合社区资源,强化社区服务功能,针对居住空间的变革,优化社区管理策略,通过多种渠道保障农民对于公共政策的知晓权和参与制定权,促进原有村落共同体向社区共同体转型,加强农民的社区认同感,使农民真正融入社区生活。

本文从微观社区角度探讨了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空间重构后的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增进了对因矿产开采而被迫失去家园的农民生活的深入了解,为未来同一类型安置社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意见。但是,本文主要揭示了目前农民居住满意度的总体特征,而对样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特征分析不足,未来可进一步增加样本容量,开展追踪研究。

参考文献:

- [1]薛黎明,王豪杰,朱兵兵,等.煤炭资源可持续力评价与系统协调发展分析[J].经济地理,2020,40(1):114-124.
- [2]常小燕,李新举,刁海亭.采煤塌陷区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分析[J].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20,37(2):169-178.
- [3]李太启.皖北矿区压煤村庄土地利用方案优化[J].矿山测量,2015(4):32-35.

-
- [4]徐艳,王璐,樊嘉琦,等.采煤塌陷区生态修复技术研究进展[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0,25(7):80-90.
- [5]吴鹏.论采煤塌陷区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的完善——以淮南市采煤塌陷区为例[J].资源科学,2013,35(2):455-461.
- [6]毛旭阁.废弃矿山采煤塌陷区土地复垦综合治理模式研究[J].中国煤炭,2018,44(1):132-136.
- [7]Xiao W,Fu Y,Wang T,et al.Effects of land use transitions due to underground coal mining on ecosystems services in high groundwater table areas:A case study in the Yanzhou coalfield[J].Land Use Policy,2018,71:213-221.
- [8]李文彬.中国压煤村庄搬迁模式研究[D].北京:中国矿业大学,2016.
- [9]马靖华.矿区压煤村庄搬迁动力机制与PPP模式研究[D].北京:中国矿业大学,2019.
- [10]陈景平,胡振琪,袁冬竹,等.采煤塌陷区搬迁村庄耕作半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研究[J].农业工程学报,2019,35(8):287-295.
- [11]温中富.山东省枣庄市失地农民补偿问题研究——以C煤矿为例[D].长春:长春工业大学,2016.
- [12]黄翌,李效顺,汪云甲,等.压煤村庄搬迁的理论分析与绩效评价[J].中国煤炭,2013,39(5):5-11.
- [13]Yang X,Zhao H,Ho P.Mining-induced displacement and resettlement in China:A study covering 27 villages in 6 provinces[J].Resources Policy,2017,53:408-418.
- [14]冯健,林文盛.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进展,2017,36(2):159-170.
- [15]Mohit M A,Azim M.Assessment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housing in Hulhumale,Maldives[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2,50:756-770.
- [16]Clark W A V,Ledwith V.Mobility,housing stress,and neighborhood contexts:Evidence from Los Angeles[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6,38(6):1077-1093.
- [17]张文忠.城市内部居住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方法[J].地理科学,2007,27(1):17-23.
- [18]何深静,齐晓玲.广州市三类社区居住满意度与迁居意愿研究[J].地理科学,2014,34(11):1327-1336.
- [19]湛东升,孟斌,张文忠.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J].地理研究,2014,33(2):336-348.
- [20]刘志林,廖露,钮晨琳.社区社会资本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北京市中低收入社区调查的实证分析[J].人文地理,2015,30(3):21-27.
- [21]张景秋,刘欢,齐英茜,等.北京城市老年人居住环境及生活满意度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12):1628-1636.
- [22]Feng J,Tang S,Chuai X.The impact of neighbourhood environments on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people:

Evidence from Nanjing, China[J]. Urban Studies, 2018, 55 (9) :2020-2039.

[23]夏永久, 朱喜钢. 城市被动式动迁居民社区满意度评价研究——以南京为例[J]. 地理科学, 2013, 33(8) :918-925.

[24]何艳冰, 黄晓军, 杨新军. 西安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评价[J]. 经济地理, 2017, 37(4) :149-157.

[25]Addo I A. Assessing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mong low income households in multi-habited dwellings in selected low income communities in Accra[J]. Urban Studies, 2016, 53(4) :631-650.

[26]吴莹. 空间变革下的治理策略——“村改居”社区基层治理转型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7, 32(6) :94-116.

[27]杨云彦, 徐映梅, 胡静, 等.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基于南水北调库区移民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08(11) :89-98.

[28]张艳, 柴彦威, 郭文伯. 北京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空间的社区分异[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5) :65-71.

注释:

1 李克特五分量表中, 一般均值在 1.0~2.4 之间表示不满意, 2.5~3.4 之间表示一般, 3.5~5.0 之间表示满意。